

王充对董仲舒反动教育思想的批判

教育学教研组

在阶级社会里，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了解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的教育思想及他对“汉代孔老二”董仲舒反动教育思想的批判，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上进步思想家怎样与反动儒家教育思想作斗争；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怎样利用孔孟之道通过教育这块阵地为它的反动统治服务；有助于增强我们对教育领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认识，从而不断提高我们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自觉性。

王充（约公元27—97年），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出身平民家庭，当过地方小吏，后辞职还家，主要从事教书和著作，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也是进步的教育思想家。他生活的东汉王朝前期，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是封建地主阶级历史地位由上升、进步转向保守、反动的时期，也是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由“尊法反儒”（或“外儒内法”）完全转变为“尊儒反法”的时期。尤其到东汉章帝（刘炟）时，反动统治者为了从政治、思想上强化对劳动人民和进步知识分子的统治，于公元79年（汉章帝建初四年），在京都洛阳汉宫白虎观召开全国性的经学讨论会，把“谶纬”邪说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反动思想揉合在一起，凑成了一部反动经——《白虎通义》，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枷锁。《白虎通义》的出笼，是继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所掀起的一股更加乌烟瘴气的尊儒反法逆流。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在农民起义斗争的影响下，地主阶级内部要求革新的进步政治家和思想家与大地主保守派的斗争也就愈加激烈。平民出身的王充继承了先秦以来的法家思想，冒着“非圣非法”的政治风险，不信“谶纬”，逆流而上，以勇敢的反潮流精神，较系统地批判了“尊儒反法”思想。对董仲舒反动教育思想的批判，是王充批判儒家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

董仲舒在教育上的倒退、复古，主要表现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的“罢黜”，

* 谶纬：（音趁伟）“谶”是宗教预言。“纬”是用宗教迷信的观点对封建的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的解释。“谶纬”一般指俗儒假借自然界的怪异作一些隐喻譬语，以此来预测吉凶，以至国家、帝王兴衰存亡的事变等等。

就是指凡不属“六艺”的科目和孔子学术思想的都一律禁止；他的“独尊”，就是指独尊孔老二，竭力吹捧孔丘为“素王”（即后人所谓“有王之德，无王之位”的王），把孔老二抬到“神”的地位。

王充针对董仲舒“罢黜”的反动主张，提出“大才怀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乱”（《论衡·别通》）的观点，认为只有掌握了百家学说的人才，才能治理国家大事。驳斥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的反动论调。王充又针对董仲舒把孔老二抬到“王”、“神”的地位，提出人类是由物质的气构成的，“夫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论衡·道虚》），何况孔老二活着的时候还没有达到君王和诸侯的地位，这就亮出了他们吹捧孔老二是为了欺骗劳动人民的原形。

王充在《问孔篇》中，一反自董仲舒以来教育界对孔老二神圣不可侵犯的“独尊”局面，指出：“苟有不晓解之问，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就是说，后世人从事讲解有不明白、不理解的问题，向孔子追问，甚至发现孔子的话有错误而进行驳斥，在道义上有什么妨碍？真正有传授圣人事业的才智，批判孔丘的言论，在道理上有什么不对？王充开创了我国教育史上推倒孔老二的“香炉”、砸烂孔老二的“牌位”、质问孔老二的先例。

王充在揭露当时教育领域存在的“厚古薄今”的错误倾向时指出：那种跟着孔老二、董仲舒学舌的人，论述事理，总喜欢重视古代的，而轻视现在的，重视传闻的，而轻视亲眼看到的；辩论的人总是谈很久以前的，写文章的人总是写很遥远的，而对近处的奇迹却不称道，对目前发生的异事也不加笔述；儒生引证事例说明问题时，向上古求之于虞、夏、殷、周，而对近代秦和当代汉的丰功伟绩却不加重视（《论衡·齐世》）。王充站在“厚今薄古”和革新的立场，对董仲舒在教育领域散播的“尊古卑今”论调，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二）

董仲舒发挥了孔孟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提出所谓“性三品”，把人性分成三种：认为上等的“圣人之性”是天生的善；中等的“中民之性”可以通过教育、学习渐渐变为善；劳动人民的“斗筲之性”天生就是愚蠢的，只能接受“圣人”的统治。董仲舒还鼓吹唯心主义的“内视反听”的修养经，说什么“聪明圣神，内视反听，……故独明圣者知其本心”（《春秋繁露·同类相动》）。认为“圣人”的聪明才智是通过自我内心修养得来的，无需接触外界事物。

王充深刻地批判了董仲舒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认为没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指出：“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王充从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认为人的认识“须任耳目以定情实”，人的知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不管什么样的圣人，如果没有耳闻目见的感觉，对于外界事物，也是什么也不能知道的。他说：“夫术数直见一端，不能尽其实；虽审一事，曲辩见问之，辄不能尽知。何则？不目见口问，不能尽知也。”（《论衡·实知》）意思是说，用一般的标准只能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不能完全了解事物的实质；即使明白了一件事情，如果反复地去追问他，也就仍然有不了解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不用眼睛去看，不用口去问，对事物就不能彻底了解。

王充也承认，人在学习过程中才能有高低，掌握知识有早晚的差别。但是，王充认为勿论高、低、早、晚，都必须经过后天的学习。他说：“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

不问不识。”即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认识事物；如果不去学，是不可能获得知识、才能的。又说：“人才早成，亦有晚就，虽未就师，家问室学。”即才能有发展得较早的人，也有发展得较晚的人；才能发展得较早的人，虽然没有请教于专职教师，可是在家里已经有所学习了。根本不存在董仲舒之流所宣扬的什么“圣明者”的鬼话。

至于那种“一般人”暂时还没有认识的事物，而“圣人”却能较快地作出回答的问题，王充说，这不是由于“圣人”先知，而是由于学问。所谓学问，就是熟悉前人或别人的经验和知识。他认为“圣人”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掌握了前人和别人积累的知识，不是“内视反听”、“内省修养”所能办得到的。

王充还提出学习要“开心意”（《论衡·薄葬》），即在感性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思考和判断推理获取理性的知识，达到“能类推以见方来”（《论衡·实知》）。他还重视“有证”和“效验”。他说：“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论衡·实知》）就是说，一切学习和讨论，如果违背客观实际，缺乏事实根据，不使所学的知识得到证实和考验，不论说得怎样好听动人，也难以使人相信。总之，王充深刻地批驳了孔老二、董仲舒所鼓吹的人的知识才能是“生而知之”或“内心修养”而得的谬论，坚信人的学习和认识事物的过程，必须是从客观事物出发，经过目看口问，头脑分析思考和得到“有证”、“效验”，才是获得正确知识的必由之路。

（三）

以什么样的人为“师”和怎样对待“师”，历来也是儒法两家在教育思想上斗争的主要问题。汉初“汉承秦制”，从中央到地方基本上贯彻了“以吏为师”的路线。汉景帝强调：“夫吏者，民之师也。”董仲舒猖狂攻击这条法家教育路线，胡说什么：“今废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汉书·董仲舒传》），其实质是主张以“德教之官”为师，反对以“执法之吏”为师。其实，董仲舒所说的“德教之官”，不过是那些“遵先王之道”，仅仅能够懂得一点“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明师”而已。董仲舒本人就是这种“明师”的“活样板”，是大搞“师道尊严”的典型。他当了博士官后，故弄玄虚，卖价很高，仅在帷幕后给少数所谓高材生讲课，然后，由高材生传授给程度低的，再由程度低的传授给更低的。因此，当时董仲舒这个“师”，竟尊严到多数学生都不能见他一面。

到东汉，封建统治阶级为了使教育这块阵地更有力地为其反动政治服务，也就大搞“师道尊严”，把“尊师”提到了“尊重先王之道”的高度。

王充这个大无畏的反潮流战士，首先用他个人的实际行动，批判了当时的“师道尊严”和“笃守师法”。当他还是个青年，在汉代所谓“最高学府”——太学读书时，对当时的“笃守师法”就极端不满。那时教师（博士先生）说的话只准听不准驳，“经书”上的字只能注不能批，直到头发白，只许在一部“经书”里打转转。王充一眼看穿，这样的学校只能使人抱残守缺，什么真才实学也不会学到，就毅然决然离开了这样的“高等学府”。

王充冲出太学，走向社会，博览群书，不拘守儒家“经书”的章句旧法，经过长期的磨

炼，形成了他战斗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他敢冒政治风险，写出了巨著《论衡》，特别是其中具有大无畏造反精神的篇章——《问孔》、《刺孟》，到现在还闪烁着革命的火花。

王充在《问孔》中，旗帜鲜明地揭露和批判了“师道尊严”和“笃守师法”的儒家信条。

第一，揭露了当时的“师”所传授的学业只限于“五经”，老师只是整天讲授五经中的文章词句，空谈礼义的道理，对于“五经”以后的秦和汉则全不了解，知识贫乏极了。

第二，揭露了在当时教育界学生只知道迷信教师，不敢于向教师提出相反的看法。他说：儒家学者，总喜欢迷信老师，崇拜古人，以为圣贤说的话都没有错，专心致志地讲述和学习，不敢于提出辩驳和疑问。

第三，揭露了儒家所吹捧的《论语》等圣贤言论、文章往往自相矛盾，而当今的“明师”却不了解这一点。

王充手持批判的武器，提出了学生可以造教师的反，可以怀疑“圣贤”的文章、言论的革命观点，他不愧是我国教育史上具有大无畏造反精神的先驱者。

综上所述，王充的教育思想，对于促进我国历史上教育事业的发展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但是，王充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的批孔反儒多是逻辑上的批判，还没有自觉地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他在教育内容上虽有法家的观点，但没有鲜明地举起法家的旗号；在教育方法上所说的后天学习、实践，仅仅是指个人实践，还没有达到群众、社会实践的高度。然而，这些都不能掩盖他的光辉思想在教育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正如伟大导师列宁所指出：“历史功绩，不是以历史活动家较之现代的要求还没有作什么来判断的，而是以他们较其先驱者作了什么新事情来判断的”。

历史上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现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一面镜子；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历史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继续和发展。王充的教育思想的产生和他对董仲舒反动教育思想的批判表明，教育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就存在着、发展着，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现在，发展到现在，只是各有自己的时代特点罢了。叛徒、卖国贼林彪妄图达到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积极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与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相对抗。他疯狂吹捧董仲舒，是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继续；他以“韦编三绝”的精神“教子读经”，是董仲舒“独尊儒术”的重演；他的“天才论”和“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修养经”，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和“内视反听”论的翻版。林彪完全是孔老二和董仲舒的门徒，他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流毒极广，必须彻底肃清。

战斗正未有穷期。“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让我们进一步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研究儒法教育思想的斗争史，密切联系现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搞好学习与批判，搞好教育革命，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